

学海星光

大家小说

# 诗教中国 美育华夏

——读廖彬宇先生《中天而立集》有感

叶小文



叶小文（左）与廖彬宇

庚子冬，我和彬宇先生共同去往南宁出差，途中他告诉我即将要出版一部诗集，名为《中天而立集》，我心中一动，这位年轻的文化大家又给了我一个惊喜。为什么呢？因为在此前，我对他的了解，只是认为他精通《周易》，是易学家；他有专门论述老子思想的专著，是老学家；他为中华文化思想精髓构建了系统的理论框架，他还融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是文化大家。而如今，在读了他的诗稿后，我忍不住欢喜、赞叹，原来他还是一位不让古人的大诗人。

彬宇先生在传统文化领域的研究，十分深入，而且独到。他20多岁时出版了《国学旨归》第一辑，《老子汇通》代表了他对老学的研究，重点是以易解老；《干支哲学》代表了他对易象术数方面的精湛造诣，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深刻思考，很难想象这些都出自一位年方弱冠年轻人之手；他30岁时出版了《平心平天下》，对中华文化的核心精髓构建了一座理论框架，接着又出版了《大成之道》，从《论语》入手解构儒家，纵横捭阖，包容诸学，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不同凡响。每一部作品，都体现出他独到的见解与系统的建构；闪烁着思想的光芒、良知的光辉，真正做到了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殊为难得，十分罕见。无怪乎他《国学旨归》再问世，时任中国新闻社社长的郭招金先生就写了一篇《天降其才耀中华》的文章向世人推介。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他的《平心平天下》出版后，我也写了一篇介绍他思想及学术的文章《梦有根，学有土》发表在《贵州日报》。不曾想，这篇文章竟然成为他与太太的红线——他太太是在看到了这篇文章后开始关注彬宇先生、了解彬宇先生，最终在两年后的2019年冬萌生了专程赴京拜访求教彬宇先生的念头，谁知这一见，定终身。彬宇先生在一见面时便说：“你是我妻子，我一直在等你”……

上天有好生之德，君子有成人之美。一不小心，我竟然就促成了一对璧人的姻缘，这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又或是福德因缘不可思议。彬宇先生自幼走了一条传奇之路，和他夫人也是一桩奇缘，这从他《吾妻吟》一诗便可大体了解。我一生中见过的所谓神奇事件也不算少，而今又再度见证并见证了。

对于诗，彬宇先生也有极独到的见解，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甚至出版这部诗集也是他宏伟计划的一步，并非仅仅为诗而写、为出版而写。他是想要推广并弘扬一个他所认为的伟大理念，助推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他和我谈了很多，让我深受触动、大为感动。情可佩，志可嘉。而这个伟大的理念便是——诗教。

彬宇先生从“传统文化进校园”这一话题说起，说出一个关于诗教的震人心魄的奥秘。

现在，大家都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于是，有了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倡议与呼声。然而，传统文化进校园怎么进、进什么？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彬宇先生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在当代传统文化研究中，涉猎面既广、且深，研究成果还能自成体系、自成气派的年轻一辈学人里，彬

宇先生独树一帜、独占翘楚。他自幼用功于传统文化，熟读经典，可以说他完全是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传统文化培养了他，他就必然要弘扬传统文化。他越成功，也就越加证明传统文化具有不凡的功力。那么，他是怎么学习传统文化的？他的学习经验，对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否具有借鉴意义？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彬宇先生的答案是，中华文化中教育的根本方法是“寓教于乐”，即培养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兴趣，便能自发地学、自觉地学、自强不息地学。《论语·雍也》载孔子之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兴趣引发爱好，爱好令人沉醉，都说明了兴趣的重要。而孔子作为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对诗教尤为重视，同时也将诗作为一种教育方法、教育手段，故名“诗教”。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教，是古圣先贤所倡导的以诗为教育手段的一种伟大的教育方法。孔子又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于诗”。《诗》即《诗经》，兴就是兴起、开始、振奋的意思。孔子在《八佾》中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表明一个人在国家社会生活中，想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待人接物、言辞修身等各个方面，都应当是要从学习《诗经》开始，只有这样感性的语言认识，才能激发“美”的感受，才能“绘事后素”，立德修身。

彬宇先生说，诗，本是文字游戏，却能让人在游戏中升华，成就文字般若，最终获得实相般若。所以古圣将读诗和作诗，作为一种文字游戏让大家乐在其中，引发浓厚的兴趣。要写出好诗，就必然要提升人生格局、思想境界、美学修养，必须要有海量词汇储备，在不断提升诗意境中完成自我升华，内圣修养。所以诗能连接一切学问，而一切学问也都能化身为诗。

彬宇先生生命中所接触到的第一



《中天而立集》 廖彬宇 著

## 精彩阅读

彬宇先生说，诗，本是文字游戏，却能让人在游戏中升华，成就文字般若，最终获得实相般若。所以古圣将读诗和作诗，作为一种文字游戏让大家乐在其中，引发浓厚的兴趣。要写出好诗，就必然要提升人生格局、思想境界、美学修养，必须要有海量词汇储备，在不断提升诗意境中完成自我升华，内圣修养。所以诗能连接一切学问，而一切学问也都能化身为诗。

本课外书是《唐诗三百首》，在读诗背诗的过程中也逐渐爱上了作诗。从写顺口溜到写打油诗，再到古风诗、格律诗，从形式为诗到内容与内容皆诗，这不断地变化提升过程，也正是彬宇先生思想境界、情怀格局、器识学养的综合提升。他说，为了把诗写好，在这过程中就拼命读书，读经典，读历史，掌握词汇量，博览群书，再将所思所学变而为诗，就完成了创造，既是创造性转化，也有创新性发展，把所学化为所思，将所思纳入所学，进而融入血脉精神，进行人格塑造、格局拓展、智慧发掘，这便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根本价值所在。他于是鲜明、高明、独到、系统地、创造性地首次提出了诗教这一伟大教育方法中蕴含着十多项功能，彬宇先生将之概括为“五学九维一情怀”。

我问他何为“五学九维一情怀”，他说诗中包含着哲学、文学、美学、史学、音韵学五学；包含着逻辑思维、灵感思维、类比思维、跳跃思维、形象思维、辩证思维、战略（统摄）思维、发散思维、圆融思维九维；一情怀即诗中包含着悲天悯人的大担当、大格局、大情怀。

我由衷地赞叹，诗教确实是孔子最为重视的、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教育方法。彬宇先生发现了诗教的伟大，而这同样也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我不禁也试写一首七律，赞彬宇先生：

文脉相承通上下，  
江山代代有新人。  
中天而立光真际，  
振世之才贵绝伦。  
笔底诗豪惊北斗，  
襟怀海宇振精神。  
勋华国里无双士，  
万象星罗集一身。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宗教局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书记、副院长）

## 献给杨绛先生诞辰110周年的微小礼物

与辛亥革命同龄的杨绛先生（1911—2016），是成就丰富、影响深远、独具魅力的现代中国文学家。今年是杨绛先生诞辰110周年，也是她离世（“我们仨团聚”）5周年。作为一种文字纪念方式，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研究专著《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作为第一部系统梳理研究、深入解读杨绛毕生文学创作的专著，这本探索性的小书在热爱杨绛的众多读者中引起真诚回响，让我再次深切感受到杨绛的独特精神魅力，也让我有更多机会与读者交流关于杨绛毕生文学创作及其人格精神的思考。

《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脱胎于我在北师大完成的博士论文，从开始研究到写作、修订、出版，历时整整8年。在一个充满喧嚣和诱惑的时代，身处杨绛所说的“软红尘里”，潜心一志“坐冷板凳”从事学术研究，需要有充沛不衰的动力。我的研究动力，源于对杨绛其人其文的理解和认同。我面对的研究对象，是八卷本的《杨绛文集》，是文学家杨绛长达80余年、跨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边界的创作历程和丰富作品，包括她的戏剧、小说、散文创作及主要作品。我试图透过文字深入杨绛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变迁和知识分子精神演变的历史背景中，重新思考杨绛的人格与风格，及其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意义。

有一位出版家对我说：杨绛很神秘，总是感觉难以穷尽。这句话也代表了公众眼中的“杨绛形象”。正如文学评论家胡河清所说：“钱锺书、杨绛伉俪，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锋芒。”在热闹喧嚣的当代文坛，杨绛自谦“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我是一个零”。她披上仙家法宝——“以卑微为衣料的隐身衣”，将自己隐藏在一种精纯蕴藉的语言文字背后。在文学史上，这一类与“主流”保持距离、不为一时喧嚣所左右的作家作品，虽然难以成为一时之热点，竟逐之显学，却可超越时代而传诸久远。

“我们能够猜出的谜，我们很快就猜不起”（狄金森诗句），无法猜出的谜最迷人。对于我来说，研究杨绛这样一位具有独特诗意与文心的女性作家，是发乎性情的选择。杨绛其文其思其人，深厚蕴藉而气韵生动，是一个我希望潜心探究的语言之谜、精神之谜和文化之谜。在我看来，探究这样一位作家的毕生创作，读解其中隐藏的精神信息，就像试图揭开她所珍视的隐身衣，窥见其真身与灵魂，进而探查其精神文化渊源。解谜的过程，就是从各种可能的角度，与研究对象展开深入持久的对话。专著的写作和增删修订，即对话的结果。言有尽时，诗无达诂，而真正的对话不会终结。

## 持久坚韧的百年人生与80年文学生命

杨绛出身江南名门，祖籍无锡，生于北京，成长于一个虽饱经忧患却始终充满温暖欢乐的开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杨荫杭是“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的”法官兼学者，她母杨荫榆是教育家。在杨绛心中，父亲是一位坚持民主政治理想的堂吉珂德般的“痴骑士”，对她影响至深。杨绛幼承家学，又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她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北京、上海和苏州受教育，南北文化的交融，在她身上注入了江南之灵秀与北国之深厚，塑造了外柔内刚的性格气质。

杨绛曾就读于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和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丈夫钱锺书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留学，1949年后任清华大学教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她的一生与丈夫钱锺书密不可分，世称“钱杨”。1932年冬，21岁的杨绛从闹学潮的东吴大学北上“借读”，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与钱锺书相遇，如同姻缘前定，“脚上系着月老丝线”，从此相伴一生，成为动荡世界中罕见的灵魂伴侣、文章知己。

杨绛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开始散文和小说创作；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她以喜剧作家身份登上文坛，据同时代作家柯灵回忆，在上海“沦陷”时期转向戏剧创作的文艺家群体中，“一枝独秀，引起广泛注意的是杨绛”。50年代至70年代的特殊历史时期，她中断文学创作，隐身而不搁笔，转向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同时在为日后的创作做准备。从80年代开始，杨绛重新进入创作高峰期，持续不衰，影响日增，“暮年诗赋动江关”，不但文学生命坚韧持久，而且前后期创作的价值理念和美学风格一以贯之，没有像很多同时代

作家那样前后期出现明显的“断裂”，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独特创作现象。

从1933年在清华读书时发表散文《收脚印》开始，到2014年出版长篇小说《洗澡》的续篇《洗澡之后》为止，在长达80余年的创作历程中，杨绛创作了戏剧、小说、散文等多种文体的作品，还有翻译作品和研究论著，其涉及文类之广，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她的主要作品有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悲剧《风絮》，长篇小说《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长篇记传散文《我们仨》，长篇思想随笔《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作为翻译家，她翻译的《堂吉珂德》《小癞子》《吉尔·布拉斯》《斐多》等西方经典名著，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学者，杨绛《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论萨克雷〈名利场〉》《李渔论戏剧结构》《艺术与克服困——读〈红楼梦〉偶记》等论文，也是学术精品。这些作品均收入《杨绛文集》和《杨绛全集》。

作为融贯中西文化的民国一代作家所剩无多的代表之一，杨绛是一位具有20世纪文学或文化标本意义的作家。诚如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在谈到杨绛创作时所说的：“无论是翻译，还是小说、散文创作，杨绛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和贡献。比起有的多产作家来，可以说是以少胜胜多多了。不过，杨绛的魅力不是色调斑斓，一眼可以看得出的那种。作品透露的人生体验，看似无意其实用心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委实需要用心琢磨才能品味。”杨绛属于以少胜多、精通词语炼金术的作家，其作品及表达形式中所浓缩的美学价值，的确需要“用心琢磨”，察微知著，才能体味。

## “隐身衣”下的知识分子风骨与智慧境界

杨绛身上既有古典中国的隐士风流，也有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性、历史智慧与独立人格。她一生淡泊名利，洁身自守、知命达理，并将一身隐藏在自己家庭和文学创作、翻译研究的“小世界”之中，尤其不喜欢抛头露面。在柯灵眼里，杨绛与钱锺书“同负重名，索落自甘，如出一辙。她兼擅译著，珠玉纷陈，而自谦为‘坛下人’，意谓她游移于文坛之下，和《红楼梦》中妙玉自称‘槛外人’相似”。从《杨绛文集》公布的三封私人信函看，都是在拒绝社会层面的“显”而主张“隐”。“隐”的姿态是多种多样的。“隐于朝市”比“隐于山林”要困难得多。杨绛身处闹市，却偏偏选择了“隐”。她自知“隐”之难。神仙的“隐身衣”也是一时笑谈而已。但她确有特殊的隐身法门，那就是自甘卑微地位的“凡间的隐身衣”，让人“视而不见，见而无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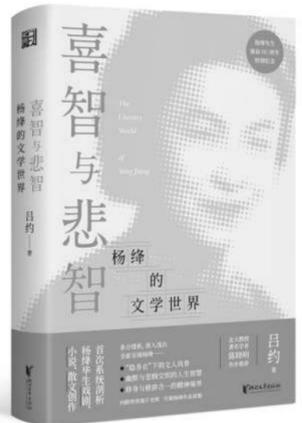
在《将饮茶》“代后记”《隐身衣》一文中，有这样一段露露心迹的文字：“我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企慕庄子所谓‘陆沉’。社会可以比作‘蛇阱’，但‘蛇阱’之上，天空还有飞鸟；‘蛇阱’之旁，池沼里也有游鱼。古往今来，自有人避开‘蛇阱’而‘藏身’或‘陆沉’。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杨绛一方面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保其天真，成其自然”的“真人”；另一方面，她在多个场合说自己是在“芸芸众生中的平常之人”，是“身处卑微的人”，是“无足轻重”的人。将这两种说法综合在一起，就是“隐身于芸芸众生中的真人”。

杨绛这样一位精于中西文化和语言，集创作、翻译和研究于一身的标准“精英知识分子”，却对这个身份弃之如敝屣，而且常以“卑微者”或“芸芸众生之一”自居。这与其说是“谦虚”，不如说是“羞与为伍”。钱锺书这样描摹杨绛的文体和风格：“世情搬演如生，空际传神着墨轻。自笑争名文士习，仄闻清照与明诚。”在杨绛眼中，学界文坛与“蛇阱”般的社会实为一体，也是“争权夺利、争名夺位的‘名利场’”，要躲开它并非易事，因此发出“人生实苦”的感叹。更“苦”的是，成了“逍遥游”的神人，甚至连保全本真也不容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于是只能“陆沉”。“陆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消极避世，它是“隐”与“显”的方便法门，其中包含接受“修身锻炼”的勇气和“立地成佛”的宏愿。可以推论，1949年初，钱锺书杨绛夫妇拒绝出国之时，就有了此种“勇气”和“宏愿”。凭钱杨的智慧，他们不会做糊涂选择。杨绛后来解释为“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

自1949年开始，此后30年的

# 杨绛的文学生命与智慧境界

吕约



《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 吕约 著

“修身锻炼”和“沉思默想”，可以看作是杨绛“求道”与“证果”的过程。杨绛说：“修身——锻炼自身，是做人的最根本要求。”修身锻炼的目标是“致中和”，从和谐中求“止于至善”。这种修身的成果，也可以通过言行和文字显现出来。文学创作的过程，正是与“修身磨炼”相配套的“修辞立诚”过程。直到1977年，年近70的杨绛又重新拿起文学创作之笔，短短10年之中，写出了包括《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洗澡》等一批优秀的散文和小说。假设杨绛没有毁掉已经完成了20个章节的小说手稿，将《软红尘里》这个长篇写完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一部浓缩她全部人生智慧和艺术才华的鸿篇巨制。尽管杨绛毁掉手稿一事是一个谜团，但已经写成的作品中，同样包含了她全部的人生体悟和艺术风格。

陈晓明先生在为我的专著所撰写的序言《重绘杨绛的文化肖像》中提出：“文学家杨绛的一生可以被仅仅限定为‘贤妻良母’吗？这显然是对消费者的某种迎合。我真正关心的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拨开媒介意识形态的种种雾障，把杨绛还给文学？我们如何从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角度去重绘杨绛的文化肖像？我们如何从杨绛这个个体出发，得以管窥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史脉动？”我写作《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旨在“把杨绛还给文学”，希望它能够帮助读者深入杨绛的文学和心灵世界，拓展杨绛阅读和研究的新视野。

（作者系十月文学院执行院长）